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后卫』变成『前锋』 内陆地区从

□ 项松林 苏立平

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后卫和前锋是足球场上球员的角色分工。后卫指的是在足球比赛中位于队伍后方，主要负责防守的运动员；前锋指的是站位靠前的球员，主要负责进球得分。球队可因球员位置调整而变得更加强大。习近平总书记把内陆地区扩大开放比喻为“从‘后卫’变成‘前锋’”，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内陆地区由对外开放的“稳定器和大后方”向“引领区和最前沿”转变，简单易懂又含义深邃，强调的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好。

足球比赛中，球员定位并非一成不变，位置调整往往能够激发球员的潜力与优势。国际足球名将亨利和贝尔都曾踢过后卫，但让足坛记住他们的更是“锋线杀伤力”。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受对外开放次序、政策及地理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曾呈现出“东强西弱、沿海强内陆弱”的状况。过去，内陆地区作为可靠“后卫”，劳动力、资源能源等优质生产要

素源源不断流向东部，成为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持续繁荣的坚实保障。这一方面意味着东部地区已成为不断隆起的地区经济“高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广大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亚欧大陆桥横贯东西、交通便利，与俄罗斯、中亚、中东欧、西欧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巨大，向西开放具有明显的区位特色和比较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内陆地区“陆、海、空、网”立体“丝路”格局逐渐形成，日益走向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后卫”到“前锋”的转变，激发的是比较优势与后发潜力，不仅为广大中西部地区引进东部的资本与产业、利用东部的技术与经验创造了良好条件，更为深入发掘本地区的特色产业、特色产品提供了契机。

足球运动员通过位置调整实现成功转型后，不仅可以使球员自身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且球队整体实力也大幅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让我们成功以低成本竞争优势快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以出口市场为依托，解决经济起飞的需求约束问题，取得了现有开放型经济的一系列成就。然而，中国对外开放仍有两大特征：一是贸易伙伴以发达国家为主，二是外资外贸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指出，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未来，要想拓展发展空间，仍需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将不同地区开放进程与区域重大战略联动起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让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正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球队因球员调整更为强大，奉献的不仅是精彩比赛，更是新的战术灵感，示范效应极其深远。世界是多样的，不仅有沿海岸线分布的发达经济体，更有诸多远离海洋的发展中国家，任何国家都有权利追求现代化。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中，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和互联互通尚未根本实现等原因，许多远离海洋的大陆腹地完全同世界经济隔离开来，贫穷、落后、不发达成为这些国家的代名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一带一路”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让一个个“不可能”变为“可能”，助推老挝、尼泊尔、中亚国家等经济体从“陆锁国”变“陆联国”，不仅让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更让许多内陆国家也从开放“后卫”变为开放“前锋”，为更多内陆经济体提供发展新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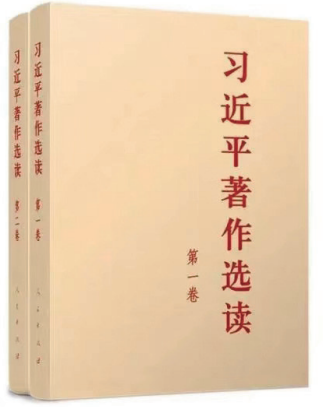
内外合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 娄季芳 郭 智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性，强调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背景下，重读这篇重要文献，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深刻阐述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市场主体一头连着国计民生，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庞大的市场主体也是我国宝贵的经济资源，在产品服务供给、解决民生就业、扩大投资消费、创新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充足动力保障。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背景下，广大小微企业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充分发挥“船小好调头”的先天优势，一方面多措并举积极自救，另一方面及时调整生产和服务布局，满足了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坚实基础。

正是因为市场主体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市场主体是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是经济体系的基本单元，对市场信号最敏感，从而也最具有活力。因此，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坚持问题导向，科学部署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举措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市场主体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提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部署。他指出：“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要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中央的好政策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把中央政策和精神转化为同各地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好办法、好举措，使之行之有效、落地生根。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

存、成长发育、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落实这一要求，一要实施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宽容失败，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三要推进简政放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支持企业更好参与市场竞争和竞争。四要实施好外商投资法，放宽市场准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保障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提升服务保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定外商投资信心。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同企业交往，坚决防止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问题损害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落实这一要求，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做好服务保障“加法”，领导干部要自觉担负起促进改革发展的重任，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另一方面，要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解开束缚企业发展的绳索，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企业实现规模效益最大化。同时，要高度重视个体工商户发展，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支持。

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并对企业家提出殷切希望

企业家精神是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提出五点希望，指出企业家“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

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的生力军”。这些重要论述为广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是希望企业家们增强爱国情怀。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带领企业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二是希望勇于创新。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三是希望诚信守法。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四是希望承担社会责任。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五是希望拓展国际视野。企业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通过内外合力打造更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推动中国经济的巨轮行稳致远。



我们的学术不能拘泥于西方的框框

——民俗学家钟敬文的治学之道

□ 向云驹

今年是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他一生成就斐然，最具贡献的是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成果，被誉为“人民的学者”，也被国内外学者尊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他跟着中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也跟着他

钟敬文爱好诗文，受新文化运动影响，1922年至1926年，采集了包括客家山歌、海边的咸水歌在内的大量歌谣文本，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也成为钟敬文迈入民俗学的引路者。他的歌谣搜集、发表、评论得到了著名学者和民俗研究家们的关注与肯定，他编著的《盍歌》由刘大白作序，称其“在民间文学横的比较研究上，功绩是不容忽视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论及歌谣研究会的成就，将钟敬文与常惠、顾颉刚、董作宾等相提并论。

1927年，钟敬文进入中山大学，在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筹备时便参与其中。自进入中国民俗学核心学术群体起，中国民俗学便一直跟随着他的人生和学术轨迹。在中山大学时，钟敬文接触了英国传统人类学派狭义民俗理论，学术视野也向世界打开。

1928年赴浙江杭州，翌年春在浙江大学等校兼任国文讲师。这一时期他与一千同事同好，在民俗学事业上掀起了学术高潮，一是编辑出版民俗学刊物《民国日报》以及《东南日报》的《民俗周刊》，二是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参与编辑出版中国民俗学会丛书12种、民间文化资料小丛书10种、论文集2种，以及《民间》《民俗园地》等刊物的一系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艺、民间风俗文化的“专号”、特辑、特刊等。在“中国民俗学会”名义下开展的活动，不仅使钟敬文个人，也使中国的民俗学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目标和追求。

1949年，钟敬文专赴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会后，为创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留京筹备。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钟敬文任副理事长并主持工作。1978年春，钟敬文联合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发起《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促使民俗学学科恢复。1981年，钟敬文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批批准的博士生导师。此后20年，他为我国民俗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学术潮头为中国民俗学鼓与呼

对于中国民俗文化的研究，钟敬文这样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远在四五千年前，她的人民，就进入了文明开化的领域。她曾与亚洲的巴比伦、古印度，非洲和欧洲的古埃及和古希腊，先后成为人类曙光期的文化灿烂的国家。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曾经辉煌的古老邦国的文化，先后凋谢了。中国却有较好的命运。几千年来，她的文明一直延续着。随着时间的前进……它在数量上不但铺天盖地，异常丰饶，而且在质量上也到处呈现着耀眼的黄金碧玉。这些财富，是应该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后代骄傲和自豪的。”

钟敬文的学术研究贯穿着两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民俗学是一门发端于西方欧洲的重要社会科学，学习它和运用它不能割裂它与世界的联系，这门西方的学问对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具有崭新的、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二是坚持中国民俗学及其民间文化研

究，既要汲取、运用西方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格局，也要时刻持守和保有中国立场，不拘泥于西方学术的框框架架，使西方的学术为中国的研究服务。他的学术“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得他具有超乎寻常的学术敏锐性和判断力。

20世纪是一个中国学术全面更新、不断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建构与发展的时期。面对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时代变迁，钟敬文都能审时度势地带领中国民俗学勇毅前行、发展壮大。他始终都站在时代前沿、学术潮头为中国民俗学鼓与呼。他的《前奏曲——〈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专辑〉前言》（1934）一文，在全新世界大势和民族国家意识中响亮地倡导一系列相关新型学科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他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1950）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和人民立场，重估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的历史、社会、文化、文学、美学价值，对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有理论奠基之功。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钟敬文在一些重大的学术机遇期、学术发展窗口期、学术转折期，都能为中国民

俗学发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顺应了时代潮流、抓住了时代机遇。

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主张

20世纪30年代，随着钟敬文学术思想的定型和成熟，他不拘泥于西方民俗学的学术结构和框架，首先在民俗学之外提出了民间文艺学，随后又提出了民间艺术学、工艺学。他是从民间文化所包括的全部对象来建构学科、建设学术的，当一门学科覆盖不了，就建构一门新的相近的、延伸的、相关的学科来补充之，从各个角度、方向、层面进入，实现对民俗文化的全面、整体研究。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对于西方传入的民俗学，钟敬文没有否定它的西方性，也不否定它的学科独立性，但是对于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他响亮地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主张并著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为中国民俗学发展作了树标杆、壮筋骨的规划。其中，有这样几个世界性的观点和论证：第一，中国民俗学派是世界民俗学中的中国学派，这是世界民俗学看中国民俗学的正

确的定位，我们过去无此自觉，今天需要这种学术自觉，而且需要理直气壮地予以标志。第二，中国民俗学和民俗学前史具有中国特色，也在世界民俗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第三，“只有民俗学是一国性的”，“在学术上更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中国民俗学者应该认识到它，并去发展它”。中国学派不是自闭于世界，而是参与世界民俗学的一个路径。第四，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把中国的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史宝库的一种丰富”。第五，中国民俗学研究能给世界文明带来好处，“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第六，建设中国民俗学派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积极学习、消化、借鉴西方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有益成果。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

